

晚清传统知识分子的“三不朽”之路

——以津门名士徐士銮为例

汤 凌

(同济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092)

[摘要]作为晚清传统知识分子代表的徐士銮,深受传统儒学价值观的影响,其一生具有浓厚的人文关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独立的人格操守;在中国近代化变革的过程中,他本欲积极进取、立功名世,却缺乏济世救国之良方,最终不得不选择壮年隐退、立言著述的人生道路。徐氏的人生悲剧,彰显出传统思想文化在近代社会变革中的现实困境。

[关键词]徐士銮;传统知识分子;三不朽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5)06-0086-05

The “Three Immortal” Road of Traditional Intellectual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aking the Tianjin Celebrity Xu Shiluan for Example

TANG L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Abstract: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raditional intellectuals, Xu Shiluan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value view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had a strong humanistic care, strong suffering consciousness and independent personal integrity in his life;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China, he intended to be proactive in official career and built up establishment for national fame, but due to the lack of prescription to save the country, he eventually had to choose the life road of retiring in the prime of life and writing books for the rest of life. Xu's life tragedy reveals the real dilemma of the traditional thought and culture in the modern social reform.

Key words: Xu Shiluan; traditional intellectual; three immortal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有鲁国大夫叔孙豹的一段话:“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1]“立德”指“创制垂法,博施济众,德立于上代,惠泽被于无穷”^[2] 1152,树立高尚的道德以陶冶世人;“立功”指“拯厄除难,功济于世”^[2] 1152,造就伟大的功业以恩济苍生;“立言”指“言得其要理,足可传记”^[2] 1152,撰写优秀的著作以流传后世。这段话后来被概括为“三不朽”说,为孔子、孟子等儒家学者所继承,形成了传统儒家的人生哲学。儒家深切关注国家和社会,回应当下的现实人生,“三不朽”被传统知识分子视为最神圣的人生理想。

当古老中国开始遭受欧风美雨的侵袭,出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候,士大夫阶层的绝对地位开始发生转变,知识分子群体逐步出现分化,但是,当时其中大部分人仍然坚守着传统思想的文化堡垒。他们目睹内忧外患的板荡局面,立志救黎民于水火,解百姓于倒悬,然而在其忠君思想、立场诉求和人生际遇等的束缚下,既无力改变旧的现状,又不能找寻新的出路,最后不得不出世归隐,在矛盾与苦闷之中余生度过——津门名士徐士銮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笔者拟以徐士銮为个案,探讨这一类近代传统知识分子在“三不朽”价值观的抉择中所面临的尴尬处境。

收稿日期:2015-08-04

作者简介:汤 凌(1989-),男,湖南怀化人,同济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古代叙事文学。

徐士銮(1833-1915),字苑卿,号沅青,天津人,晚清官僚、画家、著述家、刻书家。徐士銮出身天津寿昌堂徐氏,是民国总统徐世昌的曾叔祖。1915年,徐世昌纂修徐氏家谱时,还曾请求徐士銮为徐家后代沿取字辈。徐士銮与书画家华世奎、吴昌硕同出津门硕儒杨光仪门下。咸丰八年(1858)中戊午科顺天举人,开始步入仕途。后任内阁中书、内阁典籍、文渊阁检阅、内阁侍读等职,并记名御史。同治十二年(1873)选授浙江台州知府,但49岁便托病辞官。此后30余年,他一直赋闲津门,专心著书,“日手一编自娱”^[3]。宣统三年(1911),宣统帝退位,徐士銮“忧心殷殷,文酒酬酢,颓然寡欢”^[4],直至民国四年(1915)八月三十日去世,享年83岁。在徐士銮的一生中,批判与保守、反对与无奈、礼教与性情的矛盾始终贯穿在他立德、立功、立言的心态和言行里。

一 立德:济世利民,毕生志愿

“三不朽”说具有明确的递进关系:立德是“上圣之人”,立功是“大贤之人”,立言是“又次大贤者”。立德不仅被摆在首要地位,而且立功、立言都必须以立德为基础。儒家主张将道德作为贯穿“三不朽”的主线,统一于“内圣外王”,即内备圣人之德,外施王者之政——古代士人修身从政的最高理想。所以,崇高的道德境界,不仅是传统知识分子最显著的特征,而且也是其人生价值追求的最高标准。徐士銮在家族文化的熏陶和启蒙恩师的教诲下,“克绳祖武,学古有获”^[4],自幼便形成了一种恬淡深识、自有操守的传统儒家人格。

(一)浓厚的人文关怀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主张人文关怀主义的思想家。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和“礼”。“礼”的实质就是通过学习周代的礼制,使世人形成为人处世的道德规范,从而形成和谐安定的社会秩序,最终确保其人文关怀思想的实施。“仁”的实质是“人”,故孟子说:“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5]仁爱作为儒家人文关怀思想的核心,为后世传统知识分子所继承并发扬。

徐士銮在任职内阁时虽然还没有直接参与政事,但是他已经能秉持着一颗仁爱之心,记录和看待社会上发生的一切现象。育婴堂是兴起于清初、专门收养孤儿或弃婴的社会慈善组织。同治十二年(1873),长芦盐商捐资扩建天津育婴堂。徐士銮闻讯后创作了《重建育婴堂碑记》一文,以此表彰“仁宪字民之实政,诸君子乐善之公心”^[6]。中年归里后,作为乡绅的徐士銮表现出对社会民生事业的高度关注。光绪十七年(1891)春,淮军制军李伯

相下令盛营卫军开挖卫津河,以作宣泄洪涝之用。五月,工程竣工。徐士銮欣然创作了《新开卫津河碑记》,以表彰其“为畿辅蒸民造福、惠溥无穷之善政”^[6]。旧时天津妓院林立,引发不少社会问题。光绪三十四年(1908),徐士銮联合其他乡绅共同集资,呈准天津县衙门成立“济良所”,作为收留教养受害妇女的慈善机构。徐士銮的人文关怀,很大程度上又来自于他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二)强烈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是古代儒家的传统。孔子说:“君子忧道不忧贫”^[7],又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7];孟子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5]传统知识分子因为承载了大同和王道理想,面对国家和社会便具有了更深的现实忧虑,这种态度后来集中表现为忧国忧民的人世情怀。

徐士銮目睹晚清社会黑暗,总是自觉针砭时弊,呼唤社会良知。但是,徐士銮的忧患意识往往又打着传统忠君思想的烙印,具有很大局限性。同治九年(1870)年五月,天津大旱。徐士銮目睹赤地千里,有感而作《敬和竹垞久旱得雨即事元韵》:

诏清刑酷吏驱除,如逐虎嗟嗟谁分。宵旰状□□□□,戮力助勤资宰辅。惟愿秦中洗甲兵,民获父安欢乐音。更期海上靖狂氛,颂献升平齐蹈舞。^[8]

一方面,他能亲眼看到“刑酷”“驱除”等残暴现象,并予以一定抨击,表现出他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另一方面,却又以“诏清”“戮力”为借口,企图替腐朽的统治者辩解,最后竟然为根本不存在的太平盛世歌功颂德,一副奴才嘴脸昭然若揭。

徐士銮作为封建统治的既得利益者,看不到现存制度的弊端,又受限于工作环境、生活范围,无法广泛而深入接触民间,没有机会了解到真实的社会现状,故而早年始终怀揣着对统治阶层一厢情愿的美好幻想。这种幻想既归因于对晚清社会政治现实的愚昧无知,又源自于传统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忠君理念。

(三)独立的人格操守

注重气节和操守,不仅是儒家道德观的直接反映,而且是传统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重要表现。从孔子开始,儒家就非常注重君子小人之辩。孔子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7],又说“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7]孔子主张君子以道义来团结大众,而不是以私利相互勾结、结党营私。清代魏源更说:“立德、立功、立言、立节,谓之四不朽”^[9],直接将“立节”纳入士人理想的“三不朽”

中。不论困顿与显达,君子都应保持高风亮节。

这种追求充分反映在徐士銮的诗歌中。同治十二年(1873)二月,徐士銮启程赴任台州,经过河北任丘时,他作有《二月过任邱道上见杏花一株》一诗:“一枝端合倚云开,艳影何堪没草莱。金谷园中春正好,不随桃李竞芳来”^[8];后又作《咏新柳》与之类似:“一株遥立傍红桥,初画蛾眉试舞腰。青眼邀君须认取,不同冶叶与倡条。”^[8]纵然顺时,还是逆境,都不随波逐流、同流合污,诗中“杏花”“新柳”象征了清高、独立的人格,颇有一种自况意味。可是,当“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之时,这也预示着徐士銮以后在政治上不可避免地受到小人掣肘。

二 立功:半生蹉跎,终成泡影

传统观念的立功就是指出仕为官,在政治、军事上建树功绩。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7]²⁰²儒家传统一直推崇“修齐治平”的理念,出仕是其必然阶段。勤奋苦读,考取功名,出仕为官是每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的必经之路,对于出身书香门第、世宦之家的徐士銮来说更是如此。徐氏家训说:“做官之道:曰清,曰慎,曰勤。”^[10]徐士銮为官20年,勤政廉洁、谨言慎行,时刻践行这三字祖训。

(一)仕途业绩的进取

中举后,咸丰九年(1859)徐士銮担任宗学教习。咸丰十一年(1861),他以报捐进入内阁,任职内阁中书。同治元年(1862)十月,徐士銮补缺要署侍读,兼文渊阁检阅、国史馆校对等诸多文职。虽然最初是依靠报捐入阁,但徐士銮却凭借出色的业务水平不断获得晋升。同治六年(1867)二月,徐士銮因编撰《皇清奏议》群臣百官年表而加五品衔;十一月,又因参与校对《清实录》咸丰帝本纪而升四品衔(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徐氏履历见于同治十一年《呈徐士銮履历单》,其中“本纪告成”对照光绪七年四月二十七日浙江巡抚谭钟麟《题为查明台州知府徐士銮患病举动为难,请准开缺回籍调理事》所言“文宗显皇帝”,即说明徐士銮曾在国史馆参与编撰《清实录》咸丰帝部分),并优先获得待选知府的资格。同治七年(1868)八月,继而推升内阁典籍、内阁侍读,第二年十一月记名御史。同治九年(1870)八月,徐士銮获得“京察一等”(京察一等是清代为外放中下级京官考核等第的制度。京察一等者,即为“守廉、才长、政勤、年富力强,并称职者”^[11],既可加级奖励,又成为内升外放的优选对象。京察一等者经皇帝两次引见面察,由军机处或吏部记名后方有外放资格),通过吏部抽签的方式,最后选授浙江台州知府。

清代知府是府一级的地方行政长官,所辖各县一切政令、税收、诉讼等皆为知府之职责范围。清初,顺治帝说:“知府乃吏治之本,若尽得其人,天下何患不治?”^[12]所以,清代统治者对于知府的素质有很高要求。知府的选用主要根据候选者的能力、经验等,分派不同级别官缺。台州知府虽为“疲、难中缺”(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七年四月二十七日浙江巡抚谭钟麟《题为查明台州知府徐士銮患病举动为难,请准开缺回籍调理事》档案:“至所遗台州府知府员缺,係疲难中缺,例归部选。”可知,台州府为中缺),但台州灾害频繁、民风彪悍,治理难度很大。徐士銮既没有督抚奏请作为保举,又没有地方任职的任何经验,初次离京、羁旅仕宦,仅凭自身能力获取晋升,便通过层层选拔,得以让朝廷委以要职,足见徐士銮在仕途上所展现的进取心。

(二)吏治文教的重视

同治十一年(1872)九月初四,徐士銮在赴任台州前曾呈折谢恩,并受到皇帝召见。他恳切说道:“伏念台州为海疆最要之区,知府有表率群僚之责,如臣樗味,深惧弗胜。惟有勉矢慎勤,讲求吏治,以期仰酬。”(引自同治十一年九月初四日,新选浙江台州府知府徐士銮《奏为奉旨补授台州府知府谢恩事》,档案出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徐士銮重视地方吏治,并首先以身作则,当担表率。同治十二年(1873)十一月,徐士銮来到温黄平原附近各县体察民情,《癸酉仲冬巡视临黄太三邑纪事四首》记录下了他的经历:“遄征漫说寒侵骨,须念号寒有庶氓”^[8]——他告诫同僚不能只顾个人温饱而要时刻关注百姓饥寒;“吏治未谙须博访,乡情略话莫生愁”^[8]——他坚持实事求是,耐心倾听群众呼声;“法宽难为顽民恕,俗美先从正士求”^[8]——他秉持司法公正,只有官员作风正派,才能美化地方风俗。徐士銮还注重官员在理讼决狱方面的实用性。他曾亲自校订并刊印《学治一得编》《明刑管见录》等专业书籍(徐士銮在重刊序言中说明了原因:“盖以刑本最为繁琐,必须粗知律例方能票拟,亦可藉看本以详求律例,然于听断犹茫然也……二书于律例听断兼而有之,并赅括一些吏治,洵为牧令必不可少之书。”^[13]),然后分发僚属,颁行县邑。

工作之余,徐士銮广泛涉猎,收集典籍中的医方、药方,辑成《医方丛话》一书,济世利民。他作郡八年、推广文教,在台州先后刊印《碧琅玕馆诗钞》《仪礼古文疏证》《确山所著书》等各类书籍数百卷,并致力于《黄岩县志》等地方文献建设。然而,徐士銮所做的一切都只限于文化教育、制度作风上的小修小补,他所无能为力的方面,恰恰是最为重要的社会民生和农业生产。

(三)民为邦本的无奈

“民为邦本”是儒家民生思想的政治基础,这在徐士銮观念里根深蒂固。儒家反对暴虐治国,提倡以德治国,要想维护统治稳定、防止王朝倾覆,就必须要注重民生、休养生息。但是晚清以降,朝廷腐败,导致贫富不均、为富不仁,外来战争的赔款又使得封建剥削日益严重,更何况当时台州水旱灾害连年,官吏不顾民生疾苦,仍然横征暴敛,百姓生活由此雪上加霜。长久以来积蓄的社会矛盾必然造成民怨激增,可统治者依旧执迷不悟、一意孤行。终于,台州先后在同治十三年(1874)和光绪五年(1879)分别爆发了“天台抗钱粮斗争”和“金满起义”两次大规模农民反抗运动。

徐士銮目睹了这一切因果缘由。他深知百姓变乱之根源在于“民生之多艰”。他不忍助纣为虐,奈何君命不可违;他力图轻徭薄赋,奈何阻力又重重。所以,除了洁身自好外,唯一力所能及的事便是抛开经济、民生等基础事业不谈,发展架空之下的文教和吏政,这样的努力终究只是徒劳无功。而当广大群众揭竿而起时,他依旧还是统治阶级的帮凶,参与镇压农民起义。

所以,当徐士銮在现实中无法实现政治愿望时,对已故先人和虚无神明的虔诚祷告便成为最好的精神寄托。光绪五年(1879)夏,因祈雨灵验,徐士銮等联名为临海元帅殿(临海元帅殿是唐代林洪的祀祠。据有关记载,临侯,即林洪,唐进士,官邓州刺史。因祷雨不惜以身相殉,邓人念其恩德,故立祠祀之)上疏“请敕封号”并署名勒碑。光绪六年(1880年)夏,同样是因供奉的三目观音祈雨灵验,徐士銮主持并集资重修了临海保寿寺。他作《保寿寺二首》曰:

古寺依山麓,松杉夹道排。云峰屏俨列,石路镜新揩。塔直圆孤影,泉清澹俗怀,申祈参佛座,康降庶民皆。

自经岳燹劫,廿载任凋零。楼敞空悬鼓,簷欹半堕瓴。僧兼农作苦,佛逐寇多灵。一意谋修建,绥丰报德馨。^[8]

这组诗标志着徐士銮创作风格和思想的变化。其一,徐士銮在台州长期体察民情,了解底层民众疾苦,对百姓深表同情,仍闪烁着不泯的社会良知。其二,若对比前文《敬和竹垞久旱得雨即事元韵》一诗,同样是面对旱灾,二者风格上存在明朗与沉郁的区别。思想上,当年的他认识到“诏清”与“刑吏”的不同,还会主动向宰辅直陈时弊、怨刺上政,依然对现世的皇帝抱有幻想;现在的徐士銮,面对时代的动荡、政治的黑暗与人民的困苦,理想的破灭已经彻底击碎他现世的幻想,所以他只能转而求

诸虚妄的存在。

光绪七年(1881年)二月十五日,49岁的徐士銮以“告病”获准卸任。“作郡未尝有赫赫之名,然亦无堕行。”^{[4]11}

可见,在整个清王朝的封建大厦即将倾塌之际,徐士銮仍旧依照传统儒家思想,勾画自己“立功”的目标,希望在地方建立政教清明的礼乐社会,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徐士銮在经过台州八年的风风雨雨后,致君尧舜的宏愿都赋予年岁消磨,兴国安邦的理想终归于虚妄幻灭,而看破红尘的他也理所当然地由“立功”转向“立言”,走上了以后30余年隐退著述的道路。

三 立言:晚年发愤,以咏终誉

“立言”即著书立说。因为文章著述不会随物腐朽,并将随作者姓名一起流传后世,故儒家主张“立言”不朽。较之立德、立功,立言本是最末一等,但是对于一般的知识分子,却似乎是最容易达到的不朽标准。一方面,若缺乏资质尚不足以立德,没有机遇又不得以立功,于是更多的知识分子便转而走向著述;另一方面,当知识分子遭遇仕途困顿或人生祸患时,“立言”又往往成为他们的思想寄托和情感慰藉,形成了“发愤著书”的历史传统。

在余下的30多年的时间里,徐士銮总结20年宦海生涯,形成了对现实社会的清醒认识,其心态也随着退隐生活而逐步趋于保守。尽管行为中仍具有入世的成分,但他再未出仕做官,以修撰、著述终老。

(一)著述刊刻:礼教为先

徐士銮在这一时期潜心著述,致力于地方志的编纂和乡邦文献的整理,完成了如《宋艳》《医方丛话》《古钱谱》《古泉丛考》等大部分著作。他整理早年汇录的三册《仙蝶图》题诗,辑成《仙蝶图咏》二卷,卷末并附仙蝶故事若干条。他针对《续天津县志》的遗漏和错误,进行了补充和考辨,增补了未载入《续天津县志》中乡贤耆旧的遗事、天津掌故,从而成书《敬乡笔述》。在杨光仪、梅小树的帮助下,徐士銮刊刻同邑张霁《读晋书绝句》《欵乃书屋诗集》等遗著。

在不少著作中,徐士銮表达出浓厚的封建伦理观和道德观。例如,其所辑《宋艳》,虽取材两宋婢妾娼妓之艳事,但实寓行善、仗义、廉洁等种种道德说教;在《敬乡笔述》中,徐士銮极力倡导忠孝节义观念,力主表彰忠臣孝子,在《周节烈刘氏》《刘节烈王氏》等文中更是对妇女殉夫行为大加赞赏,反映了他维护封建礼教的立场。

(二)文学创作:杂糅性情

在文学思想上,徐士銮虽然受到其师杨光仪影响,主张“性灵”和“诗教”,但是在实际创作中他却严重违背的,这反映了他复杂的思想。在徐士銮所刊刻的书籍中,有一本化名“津门东海癯鸥”的《癯鸥戏墨》值得注意,其意义在于揭示了他现实生活的另一面。

从题材上,此书收录了不少记述青楼狎妓的序文和与歌妓酬唱、赠答的词曲,虽然这些作品不乏表达真情厚谊,但述事青楼、吟叹歌妓必为正统士林所不耻。更重要的是,全书集浓艳词章为主,在思想上透露出消极堕落意识。譬如,开头序言诗星阁主人便道:“香山官去,铺歌席以徘徊;彭泽归来,赋闲情而醞藉。消受红裙翠黛,五马神仙,流连檀板金樽,几人风雅?”^[14]颇有一种半生“萍飘宦海”,自感“节屈箕山”,最后歌酒终老、得偿所愿的劝慰之意,这恰恰是对他晚年情志虚空的描摹。又如,其赠邵惺的《山左邵惺者因缘前记序》末尾道:“娇藏金屋,君其早续前缘,艳仿玉台,我且重为后序”^[14],乃至流连风月、沉溺美色,反映出人生虚幻、及时行乐的观念。“空是色,色即是空”一类宣扬佛家空无思想的语句在文中更是重出迭见。作为变迁社会的边缘人,徐士銮在这本书中以其特有的方式,表现出晚清社会的真实体悟,发泄出理想幻灭的绝望痛苦。

除了《癯鸥戏墨》一书外,《蝶访居诗钞》、《蝶访居文钞》等诗文集也收录有类似作品,如《感事两首》透露出他回首往事、自我解嘲的个中况味:

攘攘胡为者,云烟变幻殊。鹤鸠何巧拙,蛮触孰赢输。但与刀锥逐,都忘岁月徂。信天翁不死,且过乐相呼。

知足何来辱,斯人苦不知。蹶蹶悲骥驶,尾白笑蠹痴。华屋千椽日,寒衣百结时。菟枯争一瞬,天道总无私。^[8]

两首诗隐匿了时间、地点和人物,仅借用多个典故,暗示晚清社会尖锐矛盾和他力图缓和所遭遇的政治排挤,最后又只能将一切归结于宿命,表达出逆来顺受、人生虚无的消极思想。晚年的他没有了痛斥腐败的刚直不阿、批判时局的言语锋芒,在他看似风流放浪、玩世不恭的背后,除了隐忍,便是痛苦。

四 结语

徐士銮一生历经道、咸、同、光、宣、民国五朝两代80余年,他生活的时代正是晚清社会风雨飘摇、江河日下之时。徐士銮作为一介书生,继承了传统知识分子具备的忧患意识、人文关怀、独立人格等优良品德。从他青年进取仕途的行为、壮年作郡一

方的政绩,不难看出他救世济民的鲜明志向和建功立业的强烈抱负。但是,他“立德”终究只是代表了以忠孝节义为核心的传统道德,他“立功”所竭力维护的对象也只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腐败政权。

现实社会的矛盾成为传统文化无法解释的困境,彰显了儒学近代无以为用的宿命。徐士銮面对难以应付的形势,纠结于内心的抵牾,一方面,他既感受到无能为力的自责,又表现出无可奈何的窘迫;另一方面,他又泥古不化、固步自封,无视世界变迁的潮流,缺乏对现实社会的变革。这是相当一批囿于旧学、乏于新学的传统知识分子命运的真实写照。

二十年功名半生蹉跎。当立功不朽的理想被残酷现实所阻断,晚年的徐士銮又不得不重新拾笔著述,为不朽人生的理想做出补偿时,便决定了他人的人生注定以悲剧告终,他最终也只能成为落伍于时代的落寞文人。而徐士銮“立言”留下的这些无关政教、生动鲜活的词曲文章,所流溢出的正是处于中国社会近代转型前夜的传统知识分子颓废痛苦的情感生活和复杂矛盾的思想状态。

参考文献:

- [1]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1088.
- [2] 左丘明,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 [3] 徐世昌.大清畿辅先哲传:下册[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3:681.
- [4] 徐士銮.敬乡笔述[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
- [5] 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8.
- [6] 徐士銮.蝶访居文钞·卷一[M].抄本.天津图书馆历史文献部藏本.
- [7] 杨柏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8] 徐士銮.蝶访居诗钞·卷一[M].抄本.天津图书馆历史文献部藏本.
- [9] 魏源.默觚下·治篇二[M]//魏源集: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6:39.
- [10] 徐世昌.续修徐氏家谱[M].天津:寿岂堂,1918:45.
- [11] 赵秀玲.论清代知府制度[J].清史研究,1993(2):47-54.
- [12] 国立中央研究院.明清史料·丙编:第四本[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368.
- [13] 万元煦.啸园丛书·临邑要略[M]//上海书店.丛集成续编:第一百六十八册集部.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40.
- [14] 东海癯鸥.癯鸥戏墨[M].刻本.天津:徐氏蝶园,1885(清光绪十一年).